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

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陈争平摇龙登高摇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上 篇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及 中国经济的艰难发展

(1840—1894)

中 篇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
的形成及资本主义的发展

(1895—1937)

下 篇

不同经济体制的较量

(1937—1949)

绪 言

一、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的意义

(一) 关于经济史

经济史是这样一门科学,它通过考察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探索这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及有关规律。

经济史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之一,同时又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史学科的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具体。另一方面,经济史学科也和历史学密切相关,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二)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

“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是为认识中国近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探索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性,增进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了解而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的主要内容大致按时间顺序,阐明近代中国如何由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一步一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而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又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同时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怎样成长壮大,继而取得全面胜利等等。

(三) 学习本课程的意义

了解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下，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受不平等条约严重束缚的历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人民所遭遇的悲惨生活，以及中华民族反抗压迫与剥削，争取独立和富强的奋斗历史。

为了反抗压迫与剥削，近代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很早即开始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屈地奋斗，其中可歌可泣的事迹可谓多矣！创造了许多中国历史之最，例如中国最早自己建造的铁路、最早自己架设的电线，最早的造船厂、钢铁厂、棉纺织厂等等，都是在近代出现的。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更好地总结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使得中华民族优秀人物为了现代化事业的努力一再遭到挫折。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改变旧制度，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扫除障碍，于是又前仆后继开展了伟大的革命斗争。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什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增强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近代中国社会是处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关系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封建地主制，甚至农奴制、农村公社制等同时并存。在依靠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卵翼支持下的中国反动政权，屈从于帝国主义压力，对人民的压榨搜刮尤为残酷。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特别大。

人口多,底子差,发展极不平衡,这是中国国情的一些基本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又有其历史根源。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剥削,中国反动政权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使得中国人民越来越贫困,社会经济发展迟缓,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中国军阀割据,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通过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基本特征的历史根源,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分析中国落后的历史原因,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猿援为进一步从事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史研究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根源。通过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更好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和规律性,掌握社会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了解企业成长与市场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生产与交换的相互关系,可以为进一步从事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对近代百余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作阶段划分,可结合经济增长分析进行。经济学家们分析一国经济增长时,常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这一统计指标。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增长情况及其与国外的比较,最新的研究成果是英国学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OECD)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 粤爱麦迪逊所提供的有关 GDP数据(见表员),可供我们参考。

我们从表员可以看出,从 员愿一员愿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略有增长,但由于同一时期人口增长幅度更大,所以这 员起多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而是负增长。同期欧洲、美国、日本……,甚至包括印度等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增长,整个世界经济中这一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约有 园豫,相比之下,中国的负增长是很令人悲哀的。可以说,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十分缓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间年均增长率不到 0.1%；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也在增长，所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更低，1842—1911 年年均增长率不到 0.1%；③ 1911 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又被打断，重新出现了负增长。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百余年经济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840—1895 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之间的 55 年。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取得了条约口岸、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许多侵略特权。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基本内容是以鸦片为主的商品侵略。中国经济由原先开放性较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独立经济，变为被动开放、日益受世界市场影响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瓦解的附属国经济。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商业和金融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开始出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质变，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逐渐产生。

在这一阶段由于统治阶级压榨加重，使各地民众抗粮抗租斗争高涨，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等农民大起义。起义失败后，农村封建制度继续延续。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势力壮大。他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民间投资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厂也开始出现。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虽然出现了某些新变化，但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掠夺，以及长期大规模内战的破坏等内外因素，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极为艰难，国内生产总值为负增长。

第二阶段为 1895 年至 1945 年 8 月，即两次中日战争之间的 50 年。这一阶段正值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不只限于攫取一般的经济利益，而是要瓜分中国，建立独占的销售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对华控制，在经济上加剧了对华掠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基本形成。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全国舆论不断发出要求改变旧政策的

呼声,旧中国政府不得不实行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在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商业、工矿、交通、农业等部门都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近代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上海不仅是全国的外贸中心、内贸中心、金融中心和近代工业中心,也是远东数一数二的国际大都市。国民党统治全国后,首先利用政权力量在金融业建立了以“四行两局”为核心的官僚垄断资本体系,并向其他经济部门扩张官僚资本主义势力。

在广大农村,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

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呈缓慢上升趋势,虽然年均增长率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仍然很低,但是毕竟是正值,经济在增长。

第三阶段为 1937年 7月至 1949年,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7年 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经济近代化进程,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中国经济重新出现了负增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全面内战,使中国人民继续遭受战争带来的苦难。

战争使中国出现了三种不同经济制度相互较量的局面——日占区的殖民地型经济、国统区的官僚资本主义加农村封建主义经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三种经济制度一方面都受战争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由于各自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各自的前途:

日占区殖民地型经济由于被日本侵略者拉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必然产生强制性、掠夺性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特性,终于在 1945年 8月后失败。

国统区经济制度在支持抗战的大局上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但它在农村,损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维护少数封建地主的利益;在城市,它损害民族工商业者及广大工人与市民利益,维护少数特权阶层及投机资本的利益。可以说,国统区经济制度在处理民族矛盾问题上

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处理阶级矛盾问题上又是反人民的。这种两重性制约着国统区经济的发展。当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制度消极的一面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加强了官僚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加速这一制度的垮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行反帝反封建,发展多种经济的原则,在抗战期间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实行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与土地改革等纲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取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本教程按上述三阶段,分上、中、下三篇讲述:上篇讲述 1911—1949年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中国经济艰难发展的历史;中篇讲述 1911—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成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下篇讲述 1911—1949年不同经济体制相互较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趋于崩溃,新民主主义经济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

第 五 章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清前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曾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至 18 世纪后半叶开始走下坡。19 世纪上半叶,尽管西方资产阶级一再攻击中国人“闭关自守”,鼓吹“自由贸易”等等,但是在 19 世纪的大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的工业品仍然不能抵补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中国在中西正常贸易方面长期占据有利的出超地位。19 世纪 30 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更多的是用卑劣的毒品走私手段,用野蛮残忍的海盗行径,用血与火交织的“炮舰政策”为其开道。所谓“自由贸易”,不过是它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而已。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暴力,是毒品,是血腥,是美国学者马士所指出的外国人“嚣张不法”的情形^[1],而西方国家对华正常贸易则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第一节 清前期^[2]中国社会经济 概况及中外贸易形势

一、清前期中国社会经济概况

清康熙王朝中期,明末以来连续几十年的战乱基本结束。此时政治统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清政权实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

等举措,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雍正、乾隆两朝又进一步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许多手工业者原有的匠籍被废除,摆脱了对国家的封建人身依附;一些原来的贱民被解除贱籍,改为良民;农村绝大部分长工也摆脱了对雇主的封建身份义务,较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国力强盛,社会经济繁荣与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达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空前水平,史称这一时期为“康、雍、乾盛世”。

乾隆中后期经济高度繁荣的表层下面孕育着严重的危机。这一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乾隆六年(1741)全国约有1.5亿人,乾隆五十五年已超过2亿,4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其后人口继续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已达3.1亿人。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耕地的增长,使得人多地少矛盾日渐突出。乾隆后期朝政腐败,土地兼并加速,社会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嘉庆、道光两朝,社会矛盾更为激烈,经济发展减缓,清王朝统治由盛转衰。

农业仍然是清代中国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封建土地关系一直在农村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它主要包括地权分配关系和土地租佃关系两大内容,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土地占有关系有了较大调整,清初将明朝宗藩勋戚霸占的大量田产作为“更名田”分给农民,并采取鼓励垦荒等措施,也使得大量农民获得土地,因而清初自耕农较多,地权较为分散。但是康熙后期时土地兼并集中现象日益普遍,至乾隆后期地主势力已有很大扩张,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

地主对自己占有的土地,除自己雇工经营之外,主要是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农耕种,以收取地租。地主收取地租数量又分为分租制和定租制两种。分租制(或称“分成制”)只规定土地收获物在地主与佃户之间分配的比例,地租数量随收获的多寡而年年变动,因而又称“活租制”;定租制按照租佃土地的面积预先规定地租数额,因其“丰年不加,歉年不减”,所以又称“死租”、“呆租”等。分租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实物地租中长期占主要地位,到了清代其所占比重已逐渐减少。清代

货币地租也有发展。货币地租中又分钱租和折租两种。折租是按实物地租折成货币交纳的,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过渡形态,随时可以根据地主的需要回复为实物地租。预先交纳的钱租又称“押租”,在清代主佃关系日益松弛情况下,地主需要以经济手段保卫自己的收租利益,押租制度得到广泛发展。

清代前期,农产量提高主要依赖于轮作复种等多熟农作制的普遍采用,精耕细作传统的进一步发扬,以及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据有关专家折算,至鸦片战争前全国粮食年产量约有**猿**亿斤,比明代**员**亿斤的粮食总产值增长了一倍多,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幅度更大,这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约比明代减少了**猿**。^[猿]

广大贫苦农民为谋生,不得不进行家庭手工业生产,以作为对农业的一种补充。男耕女织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到了清前期更为坚固。农民家庭手工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或缴纳赋税所需。他们偶尔将一部分产品投于市场,主要也是为换取自家不能制作的生产或生活用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在清前期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清前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国内市场逐渐扩大,粮食、棉布分居市场交易额的第一、二位,其他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交易也都在增加。各地农村墟集、草市增多,并涌现了大批商业镇市,形成了新兴的市镇经济。乡镇贸易的商品,主要还是农民自给有余的农产品和农家副产品,因而它带有农副产品初级市场的性质,为长距离贩运贸易提供了基础。在江南市镇中,已出现专业化趋向,如乾隆《嘉定县志》载:“布商盛于南翔,花商盛于罗店。至新泾镇凉鞋,安亭、黄渡镇蓝靛,亦为商贾所集。”不少市镇成为粮、棉、丝、麻、纸张、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市场,有的成为全国性市场的起点。景德镇、朱仙镇、佛山镇、汉口镇此时并称“天下四大镇”,这四大镇实际上已是全国性的商业城市或手工业城市了。其他城市,如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重庆、天津等,商业繁荣,人口日增;上海此时已经成为“江南第一贸易大港”。在**员**世纪之前上海已是市肆栉比,仅钱庄就有**员**多家。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城乡

市场网络体系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城乡市场上,活跃着大小商人资本。拥资百万两(银两,下文同)、千万两的大商人资本逐渐兴起,并形成徽商、晋商、闽粤海商等大商帮。

二、在严格限制下中外贸易不断扩大

清前期对外贸易可分海、陆两路。陆路主要是中俄之间依靠驼、马运输进行的毛皮、丝绸、呢绒、黄金、茶叶、大黄等贸易;其他如南方依靠马帮运输的滇缅贸易等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海路在清初一度被禁,但是贸易及白银流入却禁而不止(参见表 15-1)。台湾与大陆统一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四口对外通商,准许人民出海贸易。此后,中日贸易、中国与南洋(东南亚地区)国家贸易以及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这三大方向海路贸易都在发展。

表 15-1 1684—1842 年中国白银流入估计

年份	中菲贸易		中日贸易		中英贸易		中荷贸易	
	船数	万两	船数	万两	船数	万两	船数	万两
1684—1689	20	100	10	50	0	0		
1690—1699	25	125	15	75	0	0		
1700—1709	30	150	20	100	0	0		
1710—1719	35	175	25	125	0	0		
1720—1729	40	200	30	150	0	0		
1730—1739	45	225	35	175	0	0		
1740—1749	50	250	40	200	0	0		
1750—1759	55	275	45	225	0	0		
1760—1769	60	300	50	250	0	0		
1770—1779	65	325	55	275	0	0		
1780—1789	70	350	60	300	0	0	10	50
1790—1799	75	375	65	325	0	0	15	75
1800—1809	80	400	70	350	0	0	20	100
1810—1819	85	425	75	375	0	0	25	125
1820—1829	90	450	80	400	0	0	30	150
1830—1839	95	475	85	425	0	0	35	175
1840—1842	100	500	90	450	0	0	40	200

摇摇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00页表格改编。

清代的货币制度实行白银与铜钱平行流通,而银、铜这两种币材仅靠国内产量都已不敷日益扩大的市场流通所需,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

流入的大量银、铜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币材供应量的缺额。从表 员关于 员年—员年白银流入的估算可以折射出这一时期海路三大方向贸易顺差变化大致情况。^[源]

员世纪早期,通过贸易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约有 员万多万两,数倍于国内银产量。^[缘]清政府对日本铜的需求更为殷切,鼓励华商赴日以丝易铜。倒是日本政府一再颁布法令对中日贸易进行种种限制。

清朝与南洋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中国输往南洋的主要有丝、茶、糖、瓷器和药材等,从南洋输入的主要是大米、胡椒、香料及各种海产品。

从表 员大致可以看出,中西贸易呈强劲增长势头。四口通商时期,来华贸易的西方国家商人逐渐增多。但是四口通商 员多年后, 员年英商通译员洪任辉(员老译云)乘武装商船擅闯宁波、定海和天津港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乾隆皇帝为防微杜渐,下令从 员年起对中西贸易实行严格限制,只许欧美国家商人到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并实行“公行”制度,即规定西方商人在中国的一切贸易和其他事物均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不得和中国其他商人直接进行买卖,但并不禁止欧美各国东方殖民地商人到其他三口贸易。



图 员 清 代 十 三 行 广 州 商 馆 区 一 角 (员 世 纪 初) 。 史 贝 霖 绘 , 香 港 艺 术 馆 藏 。